

# 增加香港算力資源 賦能新型工業化

### 鑄定未來：香港AI與創科轉型之路

新型工業化利用AI+具身智能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及增值，惟產業爆發式增長催生海量算力需求。本港土地受限、資助覆蓋不足等短板引發的「算力缺口」，正成為制約新型工業化落地的瓶頸。香港唯有從園區布局、政策扶持、跨區協同等多維度破局，加快綠色智算中心集群落地，算力才能真正成為產業升級的全新引擎。

#### 本地算力有待提升

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早前發布的《2025年香港企業AI應用趨勢調查》數據顯示，本港AI商用普及率極高，高達88%的受訪企業員工已將AI技術應用於日常營運、數據分析及市場推廣等工作。

然而，本地算力供給未能跟上步伐。現時全港整體算力規模約為5,000PFLOPS（即每秒浮點運算5,000千萬億次），其中作為標杆基礎的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峰值算力為3,000PFLOPS，主要承載高校科研與初創研發，難以覆蓋全港約36萬間中小企業的商用場景；定位頂級算力的沙嶺數據園規劃算力規模龐大，可實現18萬PFLOPS的超高運算，但項目預計要到2032年才全面釋放產能，漫長的建設周期難以緩解企業的燃眉之急。

受制於本地算力短缺，44%的香港企業直言面臨算力不足難題，超過七成企業被迫依靠境外雲服務，其中逾三成轉向內地超算，26%選擇海外算力資源。跨地域採購算力不但抬高了運營成本，還拖累香港「產業AI化、AI產業化」的

算力作為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AI）產業的基礎設施，已成為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新基建的核心構成。隨着國家將算力網納入國家「六網」建設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算力一體化步伐持續提速。身處大灣區核心節點的香港，正全面落地新型工業化策略，加速各行業數碼轉型。

黃永威 立法會議員

進程。

#### 為技術落地提供空間

香港依靠本土科研優勢完成算法研發、產品設計與技術驗證，再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完善的工業產能落地量產，正是新型工業化的核心。不過，受限於超算資源稀缺，大量具備研發潛力的中小企業難以接入高階AI服務，難以落地智能化改造，導致香港的研發優勢難以轉化為產業產能，發展陷入「有研發、難落地，有技術、缺算力」的困境。

土地與電力資源是大規模布局智算集群的兩大要素。北部區有全港約三分之一的土地空間，以及鄰近深圳的區域優勢，有充分條件成為香港未來算力集群的核心承載地。

據了解，中華電力早已積極加強及擴展北部區電網布局，累計落地20座以上變電站。2024年投入運作的落馬洲河套西、古河北、馬適路三座低碳變電站，供電總容量等效於4至5個香港科學園，提前為沙嶺數據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新田科技城三大算力集聚區預留了充足的用電指標，並會按北部區不同發展階段，提供適時、合適及靈活的供電方案，確保有充足電力配合算力需要。

目前中電擁有接近百分百、高度穩定的可靠供電服務。針對AI機房高負荷、高能耗的特徵，電力規劃打破了傳統依賴自然用電增長設計網絡的舊思路，將沙嶺數據園等政策導向型新增用電納入短中長期規劃。三大算力片區將鋪設專用高壓線路與地下電纜，摒棄架空線路，從基建層面提升颱風、暴雨等極端

天氣下的供電穩定性。

#### 多措並舉發展本港AI產業

為加速本港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推動新型工業化，筆者提出以下優化建議。

首先，完善頂層設計，特區政府應制訂專屬AI發展藍圖，在新型工業化規劃中釐清並訂定各行業智能化轉型目標，激活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的「產、學、研、投」協作機制，疏通科研落地堵點，在先進製造、生物科技、物流及專業服務打造本土AI示範場景。

其次，推行「港版企業算力計劃」，放寬資助門檻、實行全產業覆蓋的算力補貼，參照七成成本資助比例，切實紓緩中小企業營運負擔，規範算力市場定價；並加快粵港跨境算力互通，合法引入內地充裕算力，紓緩本地資源緊張。

再者，整合各類數碼轉型資助，在BUD專項基金增設AI產業升級專項，以政企對等配資支持智能產線改造，並優化研發稅務抵扣，減輕企業智能化投入成本。

最後，強化人才培訓，透過升格了的「技能提升局」聯合業界定製產業AI應用課程，擴大持續進修基金覆蓋，資助行業人員學習高階AI工具，持續培育複合型數字人才，築牢產業發展根基。

隨着大灣區一體化持續深化與國家算力網全域布局提速，香港要緊抓北部都會區開發的黃金窗口期，統籌土地與相關政策資源，系統化布局算力矩陣，破解當下產業算力匱乏的燃眉之急，在全國數字化產業布局中抓準獨特優勢，實現經濟的高質量轉型與發展。



# 汲取雄安經驗 精準編制香港五年規劃

朱立威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筆者早前隨團赴雄安新區考察，近距離見證這一「千年大計」的推進實踐。雄安新區在頂層設計、數字城市、產城融合及大學城建設等方面的創新探索，促使筆者反思：香港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中如何精準對接國家戰略，並藉着正在編制的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將經驗制度化、時間表化、路線圖化。

#### 以戰略定力確保規劃落地

雄安新區並非一般城市開發，而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的國家戰略工程；堅持「先規劃後建設」「一張藍圖繪到底」，以制度剛性確保規劃落地。北部都會區建設必須學習這種功能定位明確、高站位、長視野的戰略定力，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基本方法論也應如此——先定戰略目標與功能定位，再安排重大項目與時序，避免「項目堆砌」。

例如，雄安城市計算中心作為「城市大腦」，實現數字孿生城市理念，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亦已提出創科走廊與智慧城市方向，在五年規劃中完全有條件設立「數字北部都會區」專章，建立跨部門數據平台與城市運營中心，並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接，探索大灣區城市群智慧治理新模式。

在大學城建設方面，首批北京高校雄安校區已進入大規模建設階段，實現校城融合，高校與產業、社區同步規劃。香港過往在新市鎮發展中，高等教育常處於「事後擴展」位置。筆者認為，北部都會區應定位為未來人才與科技承載地，在五年規劃中吸收雄安理念：及早明確大學功能定位與學科方向，銜接大灣區產業鏈，並為師生提供可安身、安心、安業的條件。

香港五年規劃預計年底公布。在此框架下，北部都會區應被視為五年規劃中的「首要空間載體」與「重大工程平台」：一是以北部區支撐國家對香港的創科、製造業、服務業等功能定位；二是將北部區的分期建設、重大基建、公共服務納入具約束力的時間表，形成「規劃—政策—項目—督導」閉環，避免「規劃熱、落實冷」。

#### 機制創新促產城融合

事實上，雄安的體制機制創新、產城融合等經驗，為北部都會區及河套園區提供重要參照。香港五年規劃應與北部都會區專責架構、土地審批機制銜接，實現類似雄安的規劃剛性。同時，以新質生產力賦能北部區：聚焦創科平台、智慧製造、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等方向，明確量化產業目標；另外，則深化與深圳、東莞等地的產業鏈協同，打造「大灣區北部樞紐」。

當前是將雄安經驗轉化為香港制度成果的關鍵時點，筆者建議，香港應透過參與五年規劃編制及立法會機制，在規劃中明確北部都會區的國家戰略功能與時間表；在立法、財政、土地等方面提供配套安排，為北部區建設「拆牆鬆綁」，並加強與內地先行地區在規劃、數字治理、人才培育上的長效對接機制。

雄安的實踐表明，保持戰略定力與改革勇氣，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就能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建好未來城市。香港要善於學習內地成功經驗，發揮「一國兩制」優勢與國際化聯通功能，善用首份五年規劃這一制度平台，在服務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中開創新局面，為民族復興貢獻香港力量。

# 擴大使用場景 促人民幣國際化

吳煒

#### 觀海論道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2025年，在國際支付和結算體系中，佔比排名前五的貨幣分別為：美元（58%）、歐元（22%）、英鎊（6%）、日圓（5%）和人民幣（2.8%）。美元多年來不斷擴大使用網絡，成為全球主要的交易貨幣，這個過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有啟示價值。

美元的國際化之路，總結而言，是美國國力借助兩次世界大戰的契機而崛起，然後憑制度設計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國際地位。雖然在美國GDP超過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英鎊仍然是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但隨着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國際市場的貿易結算開始以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國際經貿交易結算的主流貨幣。

#### 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國際秩序

二戰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強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戰時美國多數時間處於中立狀態，雖然後期加入協約國，對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歐洲列強仍然具備相當影響力，所以戰後設立的國際聯盟總部仍然位於歐洲日內瓦，而美國因為孤立主義傳統最終並未加入，國際影響力受到限制。到了二戰，美國則成為主要參戰國，無論在太平洋戰場還是歐洲戰場西線均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且戰爭嚴重削弱了其他參戰傳統強國的實力，從而使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政治軍事影

響力達到空前高度，得以主導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金融新秩序的設立，主要國際組織聯合國總部也設在美國紐約。

戰後美元國際化的制度設計，整體來說循以下三條途徑：

一、緊緊把握貨幣是用於交換資源的本質，無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後布雷頓森林時代，美國都利用自身的國際影響力，與全球主要資源如黃金、石油綁定掛鉤並取得國際認可。

二、擴大美元使用網絡，強化使用慣性，包括「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提供大量美元援助用於重建，朝鮮戰爭中用美元向日本採購商品，促成美元的流通循環。隨着全球化國際化發展，美元成為具有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

三、不斷強化深化以美元為主體的金融市場發展，使美國資本市場和國債成為美元國際大循環回流的重要蓄水池。

總結而言，美元國際化之路具備貨幣國際化必備要素的幾個主要特點：一、強大的經濟和貿易實力；二、建設具備廣度、深度和開放的金融市場，為貨幣充分流動提供完善條件，並構建貨幣國際化的循環體系；三、保持自身政治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正向運轉，保證信用；四、在政治軍事影響力下主導制度設計，與國際主要貨物掛鉤；五、不斷擴大促進貨幣使用國家和範圍，形成使用慣性和自我強化。

至於歐元國際化更多是建立在歐洲既有的政治經濟和金融基礎上，是德國統一後

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產物。

#### 歐洲一體化提供歐元土壤

在歐元出現之前，主要成員國擁有多達十餘種貨幣，名目繁多，匯率複雜，嚴重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作為一體化之後的全球最大單一市場之一，歐元區經濟是歐元國際化的基礎，其發展的動因除了統一協調區內貨幣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深化一體化建設外，還有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及在地緣政治制裁中保持主動。為了完善國際化體系，歐盟設立了統一的央行，建立了歐洲債券市場，將歐元與氣候議程關聯（碳邊境稅綁定歐元使用），並推動歐元的擴大使用（基礎設施投資以歐元計價）。

但是歐元區的制度缺陷使其國際化之路的「天花板」明顯，尤其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使國際金融界認識到沒有協調的財政政策匹配，歐元的信用將面臨挑戰。因此，歐元的使用範圍大多仍在歐元區內。現時，歐元在SWIFT統計全球結算和支付中雖然佔比達22%，但其中有57%是歐元區內部交易，區域貨幣特徵較為明顯。與美元相比，歐元的國際化之路備受不少客觀條件約束。歐債危機後，歐洲央行有意保持歐元的穩定，以期維護尚為樂觀的儲備貨幣地位（全球外儲佔比20%，持有國均為歐元區以外國家），但政策保守反過來又抑制了經濟的發展。



# 發展銀髮經濟 應對人口老化挑戰

鄧銘心 立法會議員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執委



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筆者相信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有效應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就此，筆者提出四點具體建議。

首先，正如經民聯近年一直倡議，特區政府應盡快制訂一份全面的安老政策藍圖。人口老化不是單一福利議題，而是涉及土地、醫療、創科、金融及勞工等多個方面。特區政府應統籌目前分散在不同政策局的安老事務，在養老、敬老、安老、護老四個層面提出清晰理念和具體目標。例如，在養老方面，我們可以充分把握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機遇，預留足夠土地用作興建混合模式的長者住房、康體設施及一站式社區服務。同時，可以提供政策誘因，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長者房屋項目，讓不同經濟能力的長者將來都可以找到合適的安老選擇。在城市規劃層面，可以將無障礙環境及適老化改造作為城市建設和更新的核心內容，從樓宇設計到公共空間均要體現對長者的關懷和尊重。

其次，特區政府應發展銀髮經濟，釋放銀髮勞動力。這不單是滿足長者的消費需求，更重要的是創造條件，讓有心有力的長者繼續貢獻社會。特區政府可以多管齊下，例如設立「銀髮創業基金」，向有志創業的「老友記」提供導師培訓、資金支援和營商指導。同時，特區政府應完善現有的「中高齡就業計劃」，增加津貼額，並與培訓機構合作，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例如專業導遊班、陪月班、養生班等。此外，也應適當延長退休年齡，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務求將銀髮力量轉化為社會動能。

再者，科技是應對老化挑戰的關鍵，香港在創科方面有雄厚基礎，特區政府應推進科技賦能，支持樂齡產品的研發及應用。建議特區政府設立「樂齡科技研發資助計劃」，重點支持本地創科企業合作，研發養老機械人、遠程健康監測、認知障礙症輔助系統等高端新產品，並完善銀髮產品認證機制。我們要抓緊河套區港深創科園投入運作的黃金契機，深化產學研合作，將科研成果真正轉化落地，造福長者。同時，我們也應關注數字鴻溝的問題。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地區康健中心及關愛隊，加強對長者的科技應用培訓，讓科技真正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好幫手。

此外，特區政府應鼓勵產業融合創新，建構康養服務生態圈，包括鼓勵產業融合創新，推動醫療、養老、房地產、旅遊、金融等行業與科技企業跨界合作，共同開發創新的養老服務模式。同時，可以選擇北部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園作為康養生態的試點，盡速完成區內的基礎建設，定製產業規劃及標準，提供政策便利及財政誘因，鼓勵康養企業落戶進駐，打造完整的康養企業鏈及生態圈。

# 匹配民生需求 動態均衡擴展「粵車南下」

張美雄 西貢區議員 大灣區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6月8日，特區政府宣布「粵車南下」擴展安排：參與城市由4個擴至大灣區全部9個內地城市，每日入境市區名額翻增至200輛，並推出「易泊遊」服務。本次調整循序漸進，是對跨境交通的動態調適，展現出精準匹配民生實際需求的施政節奏。

「發展型行政法」指出政府的決策需要兼顧經濟客觀性與市場適應度，在法治邊界內尋找動態均衡點。在此視角下，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政策須在不衝擊現有法治、市場與社會承載底線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部署，同時更進一步為本港消費市場尋找新「活水」，促進兩地交融互動而收穫長遠價值。

本次最顯著的變化是名額翻倍與城市擴展。從需求上看，政策實施半年內已有約8,400個

申請獲批，「五一」黃金周期間連續多日預約爆滿，原定每日100輛已無法滿足需求。從配套上看，香港現有83支國標充電樁總共可支援超過1,600輛國標電動汽車使用，足夠支援國標電動汽車在港期間的充電需要。以經濟合理性標準審視，原定名額本是保守起點，而在歷經數月後，市場數據已然顯示需求超過供給，此時擴容是對市場需求的動態對標。

如果說「變」體現的是市場回應邏輯，「漸變」的設計則更集中體現了經濟合理性標準的精髓。對於外部性有待評估的議題，本次新調整設計了兩條漸進軌道。第一條是經濟分層遞進：6月15日起新增城市先開放「易泊飛」，7月25日起方開放「易泊遊」及入境市區服務。這樣安排是因為「易泊飛」對本地交通壓力最小，旅客不能進入香港市區，適合作為新增城市車輛的「磨合期」；而「易泊遊」需要

駕駛者對香港道路環境有更高適應度，延後推出正是降低制度摩擦的理性設計。第二條是城市梯次擴展：目標2027年第一季度前，將政策從9城推廣至廣東全省21個城市，分階段評估與擴展，避免口岸承載力受太大衝擊。逐步擴展，正是發展型行政法中合乎市場規律的行政調適，並非一刀切式行政命令。

本次擴展在若干關鍵環節亦提出明確要求：通關口岸仍限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每次最多停留3天；車輛資格嚴格限於廣東登記的非營運小型私家車；雙證雙險要求不變；以及禁止在港開辦自動駕駛功能。

縱觀此次「粵車南下」擴展安排多項措施，以數據支撐回應市場需求、分層推進，構成一次有效的跨境政策探索，既不因噎廢食，亦不失控冒進。相信這條「雙向奔赴」之路，將從政策試驗逐步走向大灣區居民的生活日常。